

北京鋼院

(副頁)

本期四版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地址：北京北郊 電話(27)441轉

1955年2月11日創刊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

1957.6.13.

76

星期四

整風學習參考資料

編者按：我們選擇了人民日報的幾篇社論及有些人的言論，供大家在“爭鳴”中學習參考。

這是爲什麼？

——人民日報6月8日社論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因爲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組擴大會議上討論怎樣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時候，發表了一些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就有人寫了匿名來信恐嚇他。這封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十分氣憤。我們反對你的意見，我們完全同意譚惕吾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你就是譚先生所指的那些無恥之徒的‘典型’。你現在已經爬到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的宝座了。你在過去，在制憲共產黨與黨外人士的牆和溝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還敢爲虎作倀，真是無恥之尤。我們警告你，及早回頭吧！不然人民不會饒恕你的！”

在共產黨的整風運動中，竟發生這樣的事件，它的意義十分嚴重。每個人都應該想一想：這究竟是爲什麼？

盧郁文在5月25日的發言中講了些什麼呢？歸納起來，一是告訴人們不要混淆資產階級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二是說國務院開會時應該有事先準備好的文件，以便討論，免得象資產階級國家的議會一樣每天爭吵，議而不決，不能說就是形式主義，就是不讓人家討論；三是說他自己同共產黨員相處得很融洽，中間沒有牆和溝；如果有些人與黨員中間有了牆和溝，應該“從兩面拆、填”，雙方都要主動；四是說共產黨人對某些批評可以辯駁，這些辯駁不能認爲是報復打擊；五是对黨外人士如何實現有職有權的問題提供了一些具體意見。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不能不問：發表這樣實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見，爲什麼就是“爲虎作倀”？“無恥之尤”？爲什麼要“及早回頭”；否則就“不會饒恕你”？

把盧郁文的發言說成“爲虎作倀”，共產黨當然就是寫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死敵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作戰的時候，的確和老虎一樣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它畏懼，屈服。但對中國人民來說，共產黨却是最好的朋友：它幫助人民推翻了壓着人民身上的反革命勢力，幫助人民收回了土地、工廠等生產資料，使人民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把自己的歷史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現在正朝着人民富裕、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邁進。最廣大的人民從來沒有象在共產黨領導的時代這樣充滿光明的希望和生的樂趣。共產黨也犯過錯誤，也有缺點，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正是要整掉這些錯誤和缺點。一切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抱有善意的人們，都在積極地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以便加強社會主義事業，鞏固黨對人民群众的領導。在這樣的時候，却有人把維護社會主義民主、維護共產黨的領導權的言論稱爲“無恥之尤”，“爲虎作倀”，把共產黨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這種人的政治面目，難道還能不引起人們的警惕嗎？這些人警告盧郁文“及早回頭”，請想想他們所說的，究竟是向什麼地方“回頭”？當然，這些人在另外的地方，口頭上也會說他們怎樣才是真正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云云。但是，難道還能相信對勞動人民的先鋒隊如此仇視的人們，是在那裏幫助共產黨整風，是在那裏擁護社會主義事業嗎？

我們所以認爲這封恐嚇信是當前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因爲這封信的確是對於廣大人民的一個警告，是某些人利用黨的整風運動進行尖銳的階級鬥爭的信號。這封信告訴我們：國內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是階級鬥爭並沒有熄滅，在思想戰線上尤其是如此。革命的老前輩何香凝先生說得好：“今天是新時代了，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

下，我們走上社會主義。難道在這個時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會有左、中、右了嗎？不會的。”她指出，有極少數人對社會主義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腦子里憧憬的是歐美式的政治，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甚至公然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着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實際是退到革命勝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之下。可是他們忘記了，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以前的中國，要想使歷史倒退，最廣大的人民是決不許可的。在全國一切進行整風運動的地方，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風運動使共產黨孤立，想使擁護社會主義的人孤立，結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們自己。在各民主黨派和高級知識分子中，有少數右派分子象盧郁文所說，還想利用辱罵，威脅，“裝出‘公正’的態度來箝制”人們的言論，甚至採取寫恐嚇信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一切豈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嗎？物極必反，他們難道不懂得這個真理嗎？

非常明顯，儘管有人叫共產黨“下台”，有人向擁護共產黨的人寫恐嚇信，這些決不會使共產黨和人民群众發生任何動搖。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而人民群众也仍然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那些威脅和辱罵，只是提醒我們，在我們的國家里，階級鬥爭還在進行着，我們還必須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並且得出正確的結論。

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

——人民日報6月9日社論

積極的、建設性的批評，對於人民的事業是永遠需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整風運動，就是一個有系統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為了鼓勵批評，為了打破批評者的顧慮，黨在整風運動的指示中指出，必須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只要是目的在於加強社會主義事業、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加強黨和人民的團結的批評，無論怎樣尖銳，都應該受到熱烈的歡迎。對於這樣的批評的任何壓制，對於批評者的任何打擊報復，都是完全錯誤的，都必須堅決反對。“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這兩句中國的古話，每一個共產黨員都應該牢記勿忘。

完全善意的批評，也可以並不正確，或者不完全正確。在這樣的情況下，就需要作適當的解釋，也就是適當的反批評。很明顯，正確的反批評並不妨礙批評的開展。它同對於批評的壓制，同對於批評者的打擊報復，毫無共同之處。允許正確的反批評是完全正常的，禁止正確的反批評才是不正常的。

至於並非善意的批評，目的在於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破壞人民民主專政、破壞黨和人民的團結的批評，這就不合於人民的利益，並不合於黨的整風運動的利益。對於這種破壞性的批評進行正確的反批評，自然更爲必要了。

有人借用對於學術文化政策上的現成的術語，把各色各樣的批評的開展也叫做“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或者簡稱為“大鳴大放”之類。這種借用，並無不可。但是既然叫做“爭鳴”，叫做“齊放”，顧名思義，當然應該既容許發表這一種意見，也容許發表那一種意見，既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否則，還有什麼“爭鳴”“齊放”之可言呢？

但是，在目前的整風運動中，恰恰出現了這樣一種不好的、甚至是極端惡劣的跡象，就

是有人在竭力企圖制止別人發表和自己不同的意見。盧郁文接到恐嚇信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今天本報所載上海復旦大學舒宗僑等人阻撓董移今發言的事件，也是一個例子。

現在確實有一些口口聲聲稱贊“齊放”“爭鳴”的人，實際上企圖只讓他們自己講話，而不讓別人答辯。他們可以把馬克思主義的道理一概封之爲“教條”，把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機構一概貶之爲“官僚主義”的制度和機構。照他們說來，發表這種意見就算做“鳴”“放”。可是，如果有人出來指出他們這種說法實際上是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社會主義，他們就立刻說：“你爲什麼出來解釋，難道這不是妨礙群眾‘鳴’‘放’的積極性嗎？”“我們是在幫助黨整風呀，一切批評，即使不正確，難道不都是對黨有益的嗎？”他們說：“你說我弄錯了事實嗎？爲什麼你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呢？”除了這些質問之外，也還有人（例如陳銘樞）從正面勸勉道：“光說缺點，不說優點，這才合乎‘整風精神’呀！”言下之意，那種既說缺點又說優點、既說錯誤又說成績的人，還有那些出來解答和辯論的人，就都是“整風”的擋路者了。於是，他們就把對方的嘴一下封住，至少也是把對方放到一個如果答辯就是“不虛心”的地位上去了。

大家想想，難道這就叫做“幫助黨整風”嗎？一個醫生任意地誇大和錯誤地判斷人們的病情，宣布某某人已經垂危，某某人已經不治；如果某人說，我雖有些小病，基本上還是健康的，你所說的病情並不符合事實，醫生就說，這就證明你不願意治病，打擊醫生積極性，這就證明你已經無可救藥。天下難道可以有這樣不講道理的醫生嗎？

從整風運動開始以來，已經提出來的對於黨和政府的批評和建議，很大部分是正確的，是必須加以傾聽、研究和採納的。可是，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錯誤言論也出現了不少。例如，現在就有人在宣傳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有人在咒罵社會主義建設全部搞錯了，有人在宣揚再延長資本主義剝削到二十年之久的“正義性”，等等。既然有這兩種不同的批評，那麼，每一個對人民事業負責的人，就不能胡里胡塗、不加區別地把一切批評都說成是對人民有益的，就不能不對那些錯誤的、破壞性的“批評”提出反駁的意見。對於錯誤意見沒有反批評，不進行辯論，不僅不能把道理弄清，而且必然使社會主義事業受到損害。鄧初民先生說：“大鳴大放之後，必須大爭”，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才基本完成，階級鬥爭並未結束，資產階級思想還在各方面和無產階級思想爭奪陣地和領導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辯論當中，就不能不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各種批評的實質，否則我們就不能正確地認識它們和正確地對待它們。

有一種不贊成反批評的人，他們把可能會出現的反批評預先起個名字叫做“收”。例如上海文匯報上就已經有人說：“最近有點‘收’的跡象”。這樣說的人，許多人是出於誤解，但是也有人是有別有用意。如果有人把合於自己心意的批評叫做“放”，把不合於他們心意的反批評就叫做“收”，把說反面話叫做“放”，把說正面話就叫做“收”，甚至還要對說正面話的人橫加謾罵和恐嚇，那麼人們不能不問：人民的言論自由，首先是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究竟是在那裏呢？如果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不許“放”，那麼，那些所謂擁護“放”的人，對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不是在實行“收”嗎？我們認爲，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言論都必須大放而特放，只能放，不能收！

真理是不怕駁的，怕駁的就不是真理。害怕批評是怯懦，害怕反批評也是怯懦。不許批評是專橫；不許反批評，又何嘗不是專橫？要去掉專橫，批評和反批評就不能偏廢。爲了克服社會主義事業中的缺點，克服黨的工作中的缺點，我們必須繼續廣開言路，堅決地開展積極的建設性的批評，繼續堅決地掃除對於有益的批評的任何障礙。同時，爲了維護社會主義事業，反對那些破壞社會主義的“批評”，必須堅決地開展正確的反批評。只有這樣，黨的整風運動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

工人說話了

——人民日報6月10日社論

這兩天，北京、上海、天津、瀋陽、鞍山等地的許多職工紛紛舉行座談會，憤怒地譴責極少數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工人階級的輿論，正在吸引着全國人民愈來愈強烈的注意。在這以前，有一部分職工曾經對某些資產階級分子要求延長定息、撤消公方代表等問題表示過意見。現在，激起工人們發言的是性質更重大、範圍更廣闊的政治題目。在這一次，各地工人發言非常踴躍，情緒非常熱烈。要求發言的工人很多，寫信給報紙的工人也很多，報紙上發表的，不過是工人的意見的一小部分。很明顯，廣大的工人羣眾看出了，在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有一股歪風，這股歪風是向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挑戰的。覺悟的工人羣眾不能不站出來了。

在近年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工商業家和知識分子發表的言論中，絕大多數都是對於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提出的善意的正確的批評，但是也有少數不如此。這少數錯誤的意見企圖使人民離開社會主義的方向，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削弱黨的領導。而且發表這種錯誤意見的人，還力圖造成一種空氣，不允許人們加以反駁，甚至對於反駁者進行威脅。正是這種情況激起了工人羣眾的憤怒，使他們在緊張的勞動中也無法沉默。

廣大的職工羣眾看得清楚，如果聽任這種右派野心分子飛揚跋扈，那末，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國家就將受到危害，社會主義事業就將受到危害。職工羣眾了解，我國工人階級近幾年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流血奮鬥的目的是什麼。他們知道，在過去的長時期奮鬥中，各種不同的人們採取了怎樣不同的態度，那些人應該受到最多的信任，那些人應該受到最少的信任。他們也知道，不管說話的人們怎樣說得漂亮，如果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對於工人羣眾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從各地職工的發言中，我們可以充分感覺到，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對於自己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誠摯擁護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熱愛。他們對於黨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也有意見，他們也要幫助黨整風，幫

助黨組織改正錯誤，克服缺點。但是他們懂得，當有人進行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產黨領導的活動的時候，最重要的問題首先是團結一致，擊退這些人的進攻。因此，他們對於一切反對共產黨、誣蔑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誣蔑社會主義的言論，表示了堅定的鬥爭的決心。

最近有一種論調，彷彿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以後，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再不需要改造了。因而得出結論說，資產階級已經不需要向工人階級學習，工人階級也沒有什麼東西值得學習，倒是工人階級應該向資本家學習許多優良品質。但是話剛說完，事實的考驗馬上就來了。對於目前的種種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究竟是誰更能夠鑒別，誰更能夠採取堅決明確的態度？工人階級的這種堅定的立場，對於全國的知識分子也有重大的教育意義。同樣的一件事，為什麼有些大學生和有些大學教授是一種看法，而工人却是另一種看法？某種無政府主義的狂熱可以煽動少數知識分子於一時，在工人和勞動人民中却完全孤立了。工人階級的情緒不但表現在英勇的建設的勞動中，也表現在對反社會主義言論的堅決的鬥爭中。這個事實不但證明了，我們的國家必須由工人階級領導，而且證明了，工人階級有充分的覺悟和決心足以領導我們的國家。

現在還有一種論調，認為既然放手讓資產階級思想“鳴”，就不能同時也讓工人階級“鳴”，因為據說，工人階級一“鳴”，就會妨礙別人“鳴”。怪哉！在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里，工人階級還要等待別人給予言論自由！當然，這種論調是無法成立的。首先，工人階級“鳴”了，並不是不允許別人“鳴”。工人階級完全可以不同意別人的意見，別人也可以不同意工人階級的意見。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誰也沒有妨礙誰。其次，如果工人階級一“鳴”，有力地駁倒了一些錯誤言論，使得資產階級在這些問題上再無理可“鳴”，那麼，這種錯誤的言論受到一些“妨礙”，於國於民，到底又有什麼不好呢？

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

——人民日報6月11日社論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團結，是經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革命的鍛煉而形成起來的。

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而進行的鬥爭，使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羣眾團結了起來。這個團結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各種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一切愛國人士。中國共產黨因為最堅定地最英勇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所以成為團結的核心和領導力量。依靠這種團結的力量，終於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民主革命取得勝利以後，為什麼中國人民的大團結仍舊能夠繼續存在呢？為什麼參加民主革命的各個階級階層沒有因為彼此的利害矛盾而分崩離析呢？這是因為中國人民面前出現了一個新的共同的奮鬥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雖然已經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但是中國仍舊是一個貧窮的在經濟和文化上落後的国家。不改變這種落後的状态，就免不了挨打，就免不了重新遭受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壓迫。中國人在帝國主義支配下過活的情況，每個愛國人士一回想就感到痛苦和屈辱。要使中國人永遠不至於再回到那種生活去，就必須使中國成為富強的工業化的国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有走社會主義這一條路。

除了社會主義，難道還有什麼別的路好走嗎？難道可以走資本主義的路嗎？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走資本主義的路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帝國主義世界裡做個殖民地，至多是做半殖民地式的小伙計，就是把大門向帝國主義國家打開，就是讓帝國主義和它的向來使用慣了的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走狗在中國重新建立起統治。所以中國民主革命以後事實上只能在這二者中選擇其一：或者向前走向社會主義，或者向後倒退到那種悲慘的痛苦的舊中國去。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社會主義首先是工人階級的事業，是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的事業，但是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還能夠取得——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在工人農民以外的愛國人民的擁護。民族資產階級，雖然由於其階級本性，不能不對於徹底消滅一切剝削制度這件事感到抵觸，但是依靠中國工人階級的一系列努力，他們的大多數經過了一些懷疑、觀望、徘徊、動搖以後，看到了社會主義是中國民族的唯一出路，因而表示願意接受社會主義。對於許多受過資產階級教育、從各方面深刻感染到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接受社會主義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隨着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各種只適合於私有制度的老的想法和老的生活方式必須改變，而對於新的東西，許多人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習慣的。但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並沒有因為這種情形而退却。他們越來越看到社會主義事業的進步性和正義性，他們也就越來越認識到，應當改造自己來適應於社會的進步，而不應當想使社會制度適應於自己。

要走社會主義的路，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中實行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方針。全國人民的革命大團結是一個偉大的力量，依靠這種力量，我國現在已經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取得勝利，而且已經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成就。

現在，社會主義不但已經成為中國絕大多數人民的不可抗拒的信念，而且已經成為實際生活的不可動搖的發展軌道。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我國祖國的獨立、富強，就沒有我國人民的自由、幸福，就不能保證六億人口的衣食住行，這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說來，已經是非常明白的道理。世界上難道還有什麼力量能夠引誘中國人民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嗎？為了說

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看一看最近期間，在社會各界人士幫助黨的整風運動的情形。企圖利用整風運動來反對社會主義、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一些右派分子以為，他們的言論一定能夠在工商業者中間得到廣泛的支持。但是事實正象在北京舉行的工商界座談會中的情形所證明的，絕大多數的工商業者終究並沒有為右派分子的甜言蜜語所迷惑，他們拒絕離開社會主義道路。這些右派分子又曾經以為可以利用青年學生的缺少社會經驗而在學生羣眾中找到同盟軍。但是事實也已經證明，當右派言論在學生羣眾中暴露出反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的時候，就遭到了絕大多數羣眾的唾棄。右派分子企圖經過工商業者、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而打開中國人民大團結的缺口，這種企圖已經遭遇到可恥的失敗，當然更不用說要在工人農民中進行什麼活動的妄想了。他們的這種妄想只會得到雙倍的打擊。

我國目前還有少數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存在，這些右派分子還在利用各種機會積極活動，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大規模的羣眾性的鬥爭在我國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但是還有政治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有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我國一去不復返，但是總有一些人還不死心，還不相信社會主義制度真能取得勝利，還想尋找機會來改變歷史的進程。

過去的革命經驗證明，每當歷史的車輛急劇地前進的時候，總會有些人從車廂中拋出來。他們不能適應客觀的變化。可是在他們被拋出以前，他們往往並不認為自己要被拋出，反而以為車子快要出軌了，快要倒臺了，而他們卻將資緣時會，成為真正識時務的角色。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歷史上空前的巨大變革，在這種大變革中更不會不發生這種情形。社會處在大變革大改組的過程中所必然發生的某些暫時性的不完善不協調，從右派分子的眼中看起來，就是表明社會主義的命運已經不妙了，人民已經離開共產黨了，人民已經討厭社會主義了。他們以為，他們一跳出這個社會主義的列車，就會有千千萬萬人跟着他們一起走。

這些右派分子的算盤打錯了。受到最廣大的人民羣眾擁護的社會主義事業一定能一天天取得更大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全國人民大團結也一定會一天天更加鞏固起來。中國共產黨提出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方針，進行黨的整風，要求社會各界人士幫助黨整風，克服黨的工作中各種缺點，這都是為了鞏固人民的團結。而黨認真這樣作的結果，全國廣大人民的團結也必然更加鞏固。

為了真正鞏固人民內部的團結，必須同堅持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進行必要的鬥爭，必須同堅持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劃清界限。我們的最廣大的人民羣眾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共產黨領導的。有一部分人對於新的社會制度的某些方面暫時還覺得不習慣，因而暫時有些懷疑、動搖和保留，這是可以理解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終將逐漸適應新的生活，並且積極參加新生活的建設。因此，他們的某些暫時的懷疑、動搖和保留，同右派分子的仇視社會主義制度是完全不同，必須嚴格區別的。人們對於我們的社會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某些現象提出善意的批評，對於共產黨員的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善意的批評，無論這些批評怎樣尖銳，對於黨和人民政府都是極其有益的。我們接受一切正確的批評，糾正錯誤，改進工作。即使這種批評有時並不完全正確，但是同右派分子的根本反對我們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也是完全不同，必須嚴格區別的。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人民民主專政？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我們的國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問題。中國人民的大團結就是建立在對這樣的問題的共同認識上面。右派分子企圖混淆人們在這種根本問題上的認識。一切真正愛國的、願意站在社會主義方面的人就應當同右派劃清界限，使對於是非問題的根本認識更加明確起來。只有這樣，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大團結才能更加鞏固。

有些右派分子本來自命為了不起的英雄，以為他們的一言一動能夠影響天下的安危。但是他們終究不能不發現，如果他們不根本改變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他們就將完全孤立，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蟲。換句話說，他們就將被拋出時代的列車以外。同他們的命運相反，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羣眾的社會主義列車，必將在共產黨的火車頭的引導下，日夜不停地轟隆隆地前進，向着無限光明的未來前進。

正確地對待善意的批評

——人民日報6月12社論

我們黨從來都教育黨員經常重視群眾的批評。最近期間，我們的黨為了開展整風運動，特別向黨外人士廣泛地徵求批評。從中央到各省市，各機關、各高級學校的黨組織都召開了座談會，或者採取其他各種措施，聽取黨外人士和廣大的工作人員的批評和建議。黨外人士對黨的批評，一般工作人員對領導人員的批評，正在全國範圍內活躍地展開。

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除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我們的黨沒有，也不應當有任何私利。我們身上的任何缺點和錯誤都會造成對人民不利的結果，我們必須堅決地加以消除。我們知道，廣大人民對我們的黨的信任所以毫不动摇，就因為我們能夠不斷的消除自己身上的缺點和錯誤而前進，黨外各方面對我們黨的意見，是我們所不可缺少的鏡子，從這方面常常可以反映出有些我們自己一時還看不到的東西，使我們的工作更容易改進。我們愈是虛心聽取黨外群眾的意見，並且努力改正自己的錯誤，黨和群眾的團結就能愈加鞏固。正因為這樣，我們的黨在開展整風運動的時候，決定放手地發動群眾對黨進行批評。

事實證明了，黨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絕大多數群眾對黨是信任和熱愛的，他們對黨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就目前的狀況看來，各方面對黨組織和黨員的批評，絕大部分是好的、正確的、對黨有益的。的確，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下，也出現了一些仇視社會主義、仇視共產黨的惡意的破壞性的言論。少數右派分子企圖把群眾的批評引入歧途，利用批評運動達到削弱社會主義事業、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削弱黨的領導的目的。因此，我們必須對右派的言論以堅決的回擊，使群眾的批評得以健全的發展。但是，毫無疑問，我們絕不能夠因為出現了右派的錯誤言論，因為對於這些錯誤言論進行了反批評，就放鬆對於一切善意的批評的鼓勵和支持。我們決不能夠混淆廣大群眾的善意的批評同少數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的批評之間的根本界限，尤其不能夠容許某些覺悟不高、作風不好的黨員借口對右派分子的回擊，就不理睬群眾的批評，甚至對批評者施行打擊和報復。相反，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繼續鼓勵和支持廣大群眾的批評，繼續認真地解除他們的一切可能的誤解和顧慮，並且堅決依靠廣大群眾的監督和幫助，改正錯誤，改進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決不能有任何的動搖。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會使是非混淆，就會使整風運動半途而廢，那就恰好達到了右派分子所希望達到的目的。

所謂善意的批評，是否必須是完全正確的呢？當然不是如此。批評者即使由於情況了解得不完全，不確切，因而提出的意見不完全正確，但是只要他是本着改進工作的積極目的而提出意見，這至少對於消除相互間的隔閡是有好處的。我們必須把這種批評同右派分子的反社會主義的批評嚴格地加以區別。這種批評雖然不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們仍然必須首先注意它們的合理的方面和正確的部分，不要因為它們有些錯誤，就一概加以抹煞。但是，這種批評既然有不正確的方面，也應當在適當時機用適當方法向批評者進行必要的解釋或批評，使批評者了解事實的真相和全貌。

群眾的批評採取了尖銳的形式，這好不好呢？這沒有什麼不好。我們應當善於冷靜地分析這種尖銳的批評，不要因為尖銳就受不住，就暴跳如雷。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實質。尖銳的批評可以是完全正確的，溫和的批評也可以是完全錯誤的。當然，有些批評者片面地追求尖銳，不免使批評帶了片面性，但是只要這種批評在根本上仍舊是善意的批評，那麼我們就仍然應該肯定它們的正確的成分，心平氣和地同批評者進行討論，也一定能夠達到相互的理解，並且逐步地幫助批評者克服片面性。

如上所說，由於善意的批評有時也是不正確的，而且這種批評者由於立場不堅定，認識不全面，甚至會在短促的時間內附和右派的言論，所以人們有時不容易一下子就區別出善意的批評和右派分子的惡意批評。因此，為了區別這兩種批評，我們必須採取謹慎態度，進行全面分析。我們不但要自己學會作好這種區別，而且要幫助一切善意的批評者也學會同右派劃清界限。

我們已經說過，在廣大群眾的批評中，絕

大多數都是正確的，至少是部分地正確的。這些批評幫助我們揭露了我們工作中的許多缺點和錯誤。凡是正確的批評，我們都應該勇敢地接受。誰要是為了面子、架子而不接受正確的批評，誰就不能作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我們應該毫不躊躇地承認那些被群眾正確地指出來的缺點和錯誤，並且迅速採取實際辦法來實現他們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要求和建議。凡是能夠馬上改正的錯誤要馬上改正，能夠馬上解決的問題要馬上解決。各級黨組織根據中央整風指示中所提出的邊整邊改的原則，已經接受黨外的批評而開始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總的說來，在這一方面做得還很不够。在我們已經開始對右派分子的反社會主義言論進行回擊以後，我們應當很快地騰出手來，認真地解決一切需要馬上解決、也可以馬上解決的問題。

當然，也有一部分批評和建議是否正確，一下子不容易弄清楚，或者問題比較複雜，牽涉的方面比較廣，不應該輕率地作出決定。這些是完全可以同群眾講清楚，並且得到群眾的了解的。但是很多批評和建議的正確性是很明顯的，接受這些批評，實現這些建議，並沒有什麼困難。對於這樣的問題，我們一定要馬上行動起來，加以解決，至少開始動手解決，而不要拖延搪塞，讓缺點和錯誤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讓群眾幫助黨整風的寶貴熱情受到挫折。

少數右派分子儘管想用他們的破壞性的言論來攪亂我們的整風運動，但是我們的整風運動一定要繼續進行到底，吸收黨外群眾幫助我們整風這件事也一定要繼續進行到底。我們愈能夠堅決地接受一切善意的、正確的批評，愈能夠迅速地改正錯誤，改進工作，黨和廣大群眾的團結也就愈能夠鞏固，而右派分子也就愈陷於孤立。反對和孤立少數右派分子，同時同一切向我們的黨善意地提出批評的黨外人士和廣大群眾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手攜手地為改進黨的工作、加強社會主義事業而鬥爭，這是保證我們的整風運動健康地發展的必要條件。

葛佩琦在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

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的座談會上說：

我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降低，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那裏去了呢？被幹部吃光了。

1949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箝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時，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民就反對他們。日本人來的時候老百姓還是照樣歡迎，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要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是看匯報多少，匯報的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給的任務。

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

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在6月5日、7日的座談會上，他又說：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么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他說，群眾為什麼不敢信任共產黨呢？因為群眾在八年中体会到共產黨善變，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顧高級知識分子，校部派公務員送飯送水，今年實行精簡節約，又取消了公務員。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對流過血和汗的人關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這些事例說明，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又說，1949年群眾對共產黨不會有這麼多意見。三害不鏟除，狂瀾既倒，挽回狂瀾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個可能被狂瀾沖走，葬身魚腹。

葛佩琦對他在以前兩次座談會上的發言內容逐點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大家對他的批評是對他的誤解。他說，我說統購統銷搞糟了，並不是反對統購統銷；說肅反搞糟了，也不是反對肅反，我說話有個習慣，就是不够含蓄，其實，我所說的“搞糟了”，含蓄一點說也就是“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的意思。

楊玉清在中國政治法律學會

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的座談會上說：

整風是“下驕”運動。有些共產黨員坐驕子，脫離群眾。八年來培養的是什麼人呢？他認為培養的是抬驕子的人。他說，至今還有人不願下驕子，那些抬驕子的人也還不願放驕桿。

楊玉清說，有人說“上級幹部太好，中級幹部太少，下級幹部亂搞”他反對這種說法，他強調說：“一切發源于北京，亂搞就從北京亂搞起。”

他說，首先在北京的上級幹部要下驕，他認為不但要下驕，有的還要下台。

楊玉清又說，過去做司法工作的人，有的該殺，有的該關，但是他認為有的不該殺，有的不該關。他還說，有的殺了，有的關了，而另一些學舊法的人却做了部長、司長。他說，

這些人應該下台，不下台不足以平民憤。還有一種人特別應該下台，人民日報總編輯非下台不可，因為人民日報幾年來都在歌功頌德，這次運動想“收”不想“放”。

楊玉清接着說，文人的筆桿天然是反現狀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現狀的，從古以來好文章都是反現狀的。楊玉清鼓吹反對現狀，鼓吹要做所謂“仁人志士”。他說，歌功頌德的人是不為人稱道的。楊玉清認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僅要廣開言路，還要“廣開賢路。他也能干事。今天的事應該誰有本事誰來干。他說，許多人不是光講話的，但是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種條件不够為借口，被一脚踢開。今天就要打破這個關。

王德周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 座談會上說：

黨已經到了面臨危機的時候了！一般群眾都說黨中央的政策是對的，就是下面錯了！但從豬肉來說，有一個胡同十二個豬肉鋪變成了兩個，豬肉買不到，說生活提高不能服人。他說蔬菜比去年漲了600%。他又說：老百姓開始對中央不信任了，有些事比國民黨時候還壞。王德周接着說：這次整風要有90%的成效，否則要垮台了！共產黨勝利了，為什麼今

天垮的這樣？與其說黨脫離群眾，不如說群眾脫離黨，現在黨快吃垮了。他還說，現在黨內有百分之九十的黨員鬧宗派，甚至無惡不作。他認為什麼時候都是武力戰勝武力。他說：鬧事要架機關，這是可以的，麻煩的是怕機關倒過來打。王德周還建議由民盟把所有群眾組織起來，幫助黨整風，監視黨整風，以取消特權達到整風的最高效果。

儲安平：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他說：“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

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的發言中說：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的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于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權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願跟着黨走，但跟着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當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

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尙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尙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二個黨外人士，也還象個聯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可能完全消滅，但是處理得當，可以緩和到最大限度。黨外人士熱烈歡迎這次黨的整風。我們都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對國事有所貢獻。但在實際政治生活中，黨的力量是這樣強大，民主黨派所能發揮的作用，畢竟有其限度，因而這種矛盾怎樣緩和，黨群關係怎樣協調，以及黨今後怎樣更尊重黨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樣更寬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國無論是才智之士抑或子子小民都能各得其所，這些問題，主要還是要由黨來考慮解決。

章乃器認為定息不是剝削 而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在今天繼續舉行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講了話。

他首先談到這次座談會開得很好，因大家都說了真話，把問題擺了出來，這樣就有利於解決。接着他說，工商改造輔導工作的出發點應該是：從消滅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間，千方百計地想辦法提高工商業者政治覺悟，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以作到妥善地消滅資產階級，只有這樣才對社會主義有利。

他認為只要明是非、除三害，就能發揮私方的積極性。

他說，對工商業者的改造，不能採取形式主義，有些人自認為立場很穩，口號喊的很響亮，給工商業者“扣帽子”，甚至用打擊吓唬的辦法，壓服他們，結果，使工商業者縮手縮腳，不敢做工作。還有的不敢接近工商業者，生怕玷污了自己。這都是形而上學，沒有真正從工人階級利益考慮問題，因為這樣就談不到團結改造工商業者了。

接着他就如何發揮和提高私方積極性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這只有六個字，就是明是非，除三害。因為宗派主義者是不願明是非的，他靠顛倒是非來弄權，只講親屬、裙帶關係，只願聽恭維、奉承。主觀主義者不可能明是非，因他脫離了客觀實際，完全憑主觀想象處理問題。官僚主義者不敢明是非，他們心里雖有是非，但怕講出來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丟掉紗帽。他們只知唯唯諾諾，唯命是從，或者做群眾的尾巴。這三者是互相統一的。

他說：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

他認為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因資本主義在中國不可能復辟，但官僚主義時時刻刻會在人們思想中復辟。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他說，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得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于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盡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却不能做到這點。他說：只有做到是非分明，按功、過提拔安排，才能真正發揮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光“重德輕才、以資代德”就會造成是非不明，調動不起來積極因素。

他說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則工作永遠做不好。

他說：關於公私合營企業里幾種關係問題，應該明確以公私共事關係為主，階級關係是殘余，因階級已基本上消滅。在工作關係中，不應該分公方、私方，黨與非黨；要按職責和分工辦事。如在工作上分公、私，分黨與非黨，工作永遠做不好，只有在思想改造的學習中，可以提醒工商業者還有階級關係殘余的存在，但也不能千篇一律，要因人而異。如果一個私方很進步，和公方、職工的關係搞得很好，就不能強調階級關係。另外，不能說定息都體現着階級關係，也要看定息收入佔總收入

大小來決定。不能把階級關係當成一種壓力，去改造工商業者，只有通過說服教育，才能達到改造的目的。

他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是不勞而獲的收入。

接着他談到定息的性質。他說：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能心平氣和。他還說，二千元以上的杆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

他還談到群眾觀點問題。他說，不關心群眾疾苦的人，儘管每天都和群眾在一起，也不會了解群眾的情況，這都是假的群眾路線。他對大家說，對資產階級要恨，但對資產階級分子要愛護，要抱着與人為善，熱愛群眾的精神去團結改造工商業者。

他認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但這兩個階級分子沒有本質的區別。他還說，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消滅。

最後，他談到工商業者兩面性的問題。他說，關於這個問題，已專門寫了文章，即將發表出來。他認為，必須辯證地看待這個問題，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說，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后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但這兩個階級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他認為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共同本性過渡。

誰說今天沒有右派言論

——天津整風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奇談怪論——

黃心平提出：

應由各黨派輪流執政。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應退出學校。

“既然黨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現在國內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黨的領導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點？”天津市立第三女中學教師黃心平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在一個座談會上對此作了解答。他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各民主黨派的黨綱又都要求走向共產主義，為什麼不可以實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做可以刺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人民服務”。他認為：“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棄政權”。最後他又提出了另外一個意見：“黨和民主黨派不應該留在學校里。學校里有黨和民主黨派的組織，是不是可以推動學校工作的進展，我很懷疑。因為學校里有黨和民主黨派，就容易產生宗派主義，製造不團結。因此，黨和民主黨派應該退出學校。而只容許學派存在，這就能推動學校和學術工作的发展”。

榮子正提出：

馬列主義的理論都是很早時期寫成的，搬到中國來，很多地方對不上號。

天津市工商業聯合會常委榮子正提出：“馬列主義在中國運用很多地方對不上號。黨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問題，都是根據馬列主義辦事，進行全面的和長期的經濟和政治鬥爭，結果損失太大，資本家倒下了。馬列主義的理論著作都是很早時期寫成的，把這些理論搬到中國來運用，很多地方對不上號。譬如政治經濟學里說，獨立勞動者上升為剝削者之後，原來的資金很快花光，然後則不勞而獲”。榮子正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則不然。我們是勤勞苦干，賺的多，花的少。而且在我們上升為剝削者之後，而是操勞更重。因此，我們學政治經濟學很多地方是聽而不信，不能接受”。